



（英）布三德◎著

傅蔚 卫昱 周蕾◎译

李鸿章同时代亲历者、英国著名记者亲自采访

还原真实的李鸿章，再现晚清跌宕时局

李鸿章

LIHONGZHANG

传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鸿章 传

〔英〕布兰德◎著 傅蔚 卫昱 周蕾◎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传 / (英)布兰德著;傅蔚,卫昱,周蕾译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3
(一世珍藏名人名传精品典藏)
ISBN 978-7-5702-0035-1

I. ①李… II. ①布… ②傅… ③卫… ④周… III.
①李鸿章(1823-1901)—传记 IV. ①K82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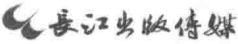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0069号

责任编辑:施柳柳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格林图书

责任印制:邱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2.5 插页: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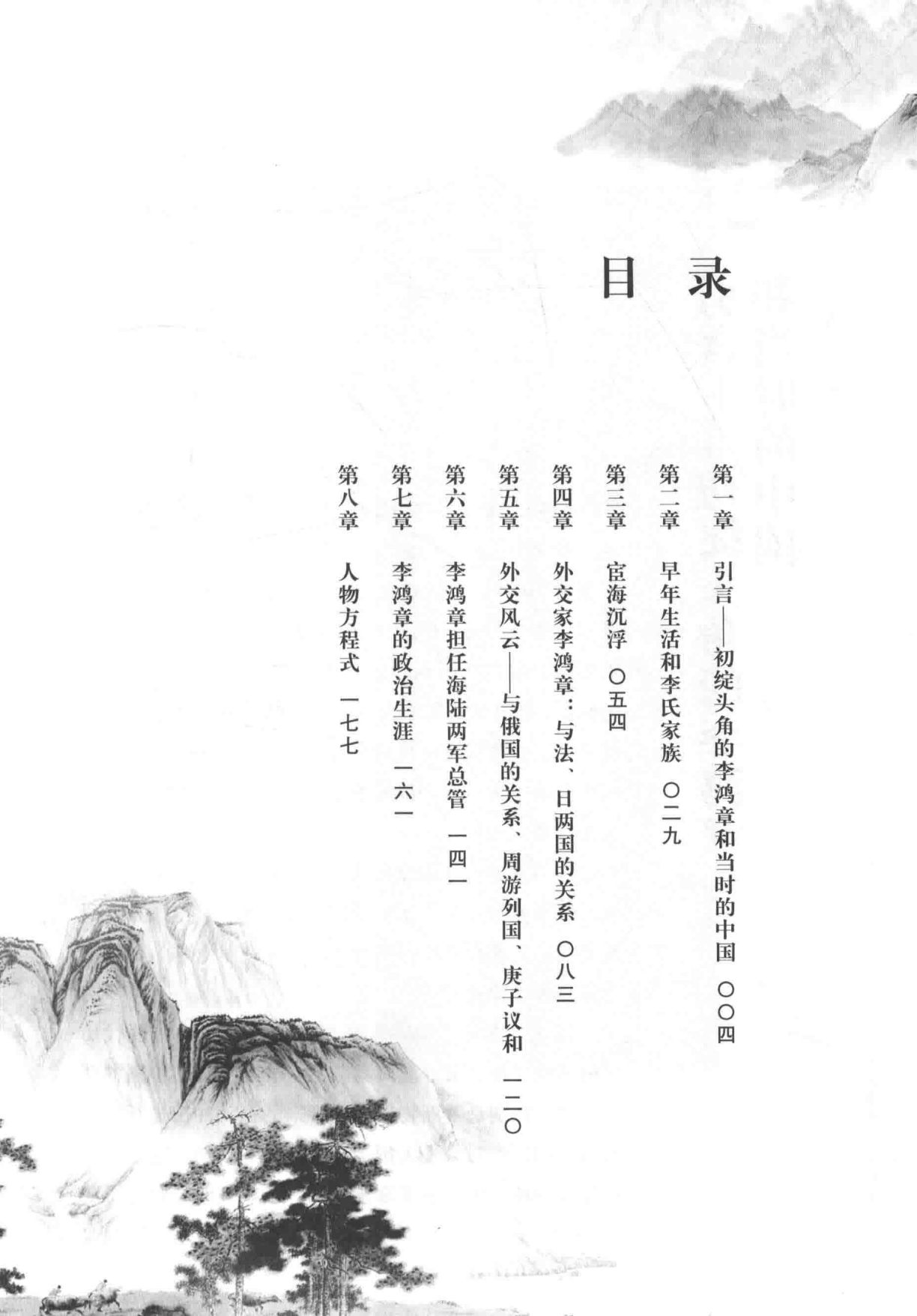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1千字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引言——初绽头角的李鸿章和当时的中国 〇〇四
- 第二章 早年生活和李氏家族 〇二九
- 第三章 宦海沉浮 〇五四
- 第四章 外交家李鸿章：与法、日两国的关系 〇八三
- 第五章 外交风云——与俄国的关系、周游列国、庚子议和 一二〇
- 第六章 李鸿章担任海陆两军总管 一四一
- 第七章 李鸿章的政治生涯 一六一
- 第八章 人物方程式 一七七



序言

英国下议院的大厅上演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仪式，如议长先生在权杖的引导下，在牧师、秘书的陪同下进行每日列队巡视；还有定期出现在国会开幕仪式上的黑杖侍卫，他用手杖敲击三下庄严紧闭的下议院大门，以此召集下议院议员来上议院开会。然而我所见过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发生在数十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正当我准备离开议院，我被叫去面见李鸿章，他刚进来准备去听一场辩论。他是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却光彩夺目。他身材颇长，表情和善，身着蓝色长袍，步态举止高贵大方，嘴角挂着礼貌的微笑，表明他对见到的一切都很欣赏。就其外貌特征而言，很难想象这一代人或上一代人中谁能够亲近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给人以功勋卓著或位高权重的印象，而是因为他的风采中散发出高贵的人品，在凡夫俗子看来，他近乎神仙一般自信超然，同时又是深谙世故的谦谦君子。

李鸿章在这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对于他神秘的祖国来说，这是超凡脱俗的特点。当我们还是用靛蓝涂抹战士身体的蛮荒人，中国人已经处于文明社会，

某些方面甚至在今天也超越了我们的文明。随着他们经历政治上的兴衰变迁，中国人孕育出一种高标准的文化，一种对于其他地域的优越感，一种不为自身或其他国际政治利益所扰乱的人格尊严。毫无疑问，这些特点源于他们的闭关自守。正如 1715 年陪同彼得大帝的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约翰·贝尔先生在其报告中所说：

“中华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其所处位置气候宜人，有益健康，东南两面环海，西北两面高山耸立、群山环绕，著名的长城就蜿蜒建在山上，形成另一道屏障。然而在我看来，帝国能够抵御外来侵略除了前面提到的，更大的保障来自向西绵延百里的沙漠……南边与东边的海洋是开放的，中国可能在那边遭受攻击；但我相信，没有哪位君主会理所当然地打破本国人民和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安宁，因为后者愿与邻邦和平共处，对其属地也心满意足。”

约翰·贝尔的预言持续了一百年，接着就如同他推测的那样，南部和东部开放的海域遭到了袭击。19 世纪的历史之所以关注李鸿章，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奉命去处理祖国古老体制遭遇的危机。由于其出身、教育和天性的缘故，李鸿章自然地沿袭了蔑视外族的民族传统，但他仍是中国人中第一个认识到“洋鬼子”不可忽视，“洋鬼子”已经到来而且将会卷入中国政治。布兰德先生的著作说得很明白，李鸿章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这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民族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但是，论及灵巧娴熟地引领国人进入无法避免的国际政治舞台，无人能出其右。尽管他有缺陷，但无可厚非他为自己和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重要性远远大于其本身。简而言之，李鸿章为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一种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贝斯尔·威廉姆斯 1917 年 3 月于切尔西

目 录

- 第一章 引言——初绽头角的李鸿章和当时的中国 〇〇四
- 第二章 早年生活和李氏家族 〇二九
- 第三章 宦海沉浮 〇五四
- 第四章 外交家李鸿章：与法、日两国的关系 〇八三
- 第五章 外交风云——与俄国的关系、周游列国、庚子议和 一二〇
- 第六章 李鸿章担任海陆两军总管 一四一
- 第七章 李鸿章的政治生涯 一六一
- 第八章 人物方程式 一七七





引言——初绽头角 的李鸿章 和当时的中国



1850年后，一系列变革改变了中国人的结构与行为——身为这其中许多变革的实际发起人，李鸿章无疑可跻身19世纪缔造者之列。但正如赫伯特·斯宾塞在其对“伟人”这一历史概念的批判性分析当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须时刻牢记，作为所有前尘往事的产物，“伟人”必须与孕育伟人的社会中所有其他现象放在一起考量。作为整个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伟人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一切一起，都是各方力量多年合力作用之下形成的结果。

李鸿章堪称中国现代伟人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想要对其事业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我们应当从这一角度研究其起步，并对李当时所处环境的主要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进行仔细探究。

因此，在记述李鸿章毕生事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之前，最好能对其政治生涯起步之初中国的总体环境，特别是欧洲物质文明带来的强大冲击进行一个大致的回顾。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武力镇压，这是李鸿章辉煌的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开始。彼时，西方军队



△ 1896 年，李鸿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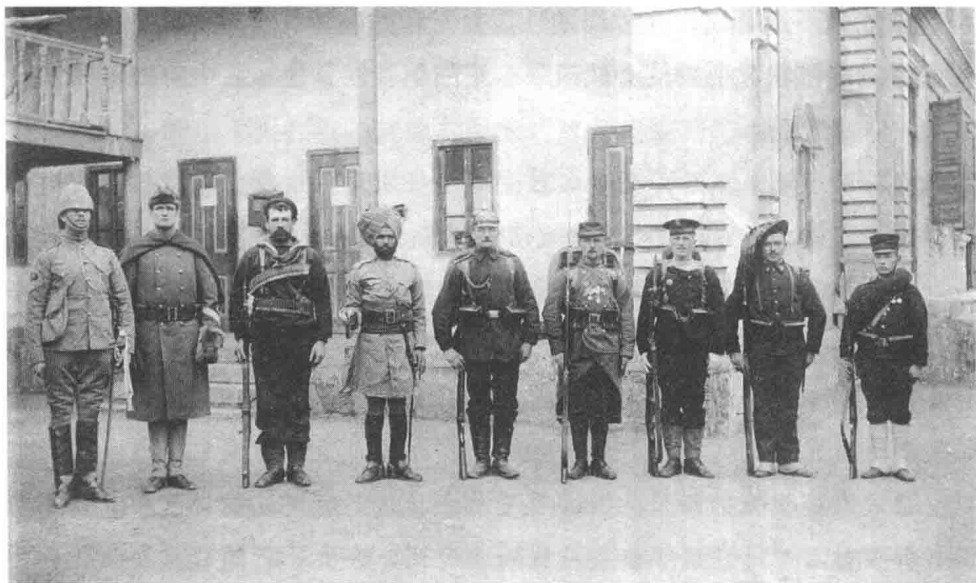
和商人对中国一直引以为豪的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状态进行入侵的现象已成常态，显然，这注定导致了中国人心态和习惯的重大变化。新力量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这个天性抗拒变化的民族，这令改变的进程注定艰辛，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带来了很大风险。李鸿章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立刻就意识到新力量的强大，并意识到需要对中国古老的教育和行政体系进行锐意变革，以适应这些全新的力量（当时的日本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没有想到的。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和自己自足，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治国之道的原则和传统在维持本国这种基于道德力量基础之上的独裁体系，以及以单一延续性为特点的文明形态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而李鸿章之所以伟大，同时也是他政绩辉煌的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基调便是——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在西方世界的蒸汽机和先进的军事科学的急速碾压之下，中国许多古老的传统都将被抛弃在容纳无用或过时之物的废弃场中。而李鸿章试图带领国人早日认识这一事实，并尽可能把环境急速变革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的努力注定会失败——这并不仅仅因为中国人从本质上无法应对快速变革，更是因为，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李鸿章自己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满清官吏。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颇具野心又贪图钱财，他的许多功绩因此而蒙尘，效用也受到损害；就连其最具进步性的追求，也常常因他身上儒士与生俱来的偏见而大打折扣。依其所见，他就是光明的象征，周围深邃的黑暗把他的光辉衬托得尤为明亮——他满怀勇气，忠心爱国，身心活力异常，潜力无限；且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均展现出许多可贵的品质。但归根结底，李鸿章从本质上仍然是所有前尘往事的自然产物，他身上不可避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所有品质与缺点恰恰是其所处时代的体现和缩影。

让我们来简单看一看李鸿章初入政坛时中国社会的大体环境。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取得重大进展——后来，正是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李鸿章首得慈禧青睐，在同僚中亦赢得口碑。李鸿章时年28岁，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并迅速跻身学者济济的翰林之列。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横扫清廷13年，波及9个省份，1亿人口因此而丧生。纵观中

国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周期性重复发作的破坏性变革正是中国社会体系之下的经济状况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笔者在其他作品中曾指出的：

回顾唐末以后（大致与西方诺曼征服同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历史总在一次次重演——暴力抗争，伴随大规模杀戮的“气数已尽”王朝的覆灭，动乱和修养生息的不断交替进行。在这样一个不断向人们灌输消极抵抗的思想，无节制生育观念如宗教般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一切都有节奏地发生着，一切都那么有迹可循。这里的经济压力是欧洲人从未经历过的——偶尔能从压力中喘口气来，也是以导致人口锐减的激烈的社会巨变为代价的。在世人的记忆中，这一切都曾被目睹——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太平天国以及西北回民反清运动中沦为荒芜之地的省份所流失的人口被周边省份的人口填补了起来，但到了下一代，这些地方又再次被饥荒的阴云所笼罩。

只要中国继续在地理上闭关锁国，在政治上自给自足，这些定期发作的动乱、杀戮和血光之灾，这些无节制的繁衍以及对过剩人口的大规模毁灭就会被统治者认为是理所当然，被其视为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在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不断加强的自愈能力，国家体制强大的凝聚力——这些优秀的品质在灾难周期性的发作中总能被成功激发。即使历经苦难，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仍得以建立。由于遵循道德治国而不是武力治国，中华文明得以千年屹立不倒，这绝非其他任何文明所能够比拟。但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之前的武装斗争，它甚至没有机会自然发展，没能一举推翻大清王朝这一历经三代帝王已然开始走向衰退、无力再用道德力量治理的王朝。在此之前，外国人介入了，他们带着长枪大炮，站在了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这边。大清王朝的地位虽然保住了，但其权威地位遭到彻底撼动，且无望完全复原。只要稍微有点儿文化的人就会发现，变化的危险正随时逼近，整个国家的前途笼罩在一片暗影当中。作为曾国藩手下的一名军事指挥官，根据自己在战场的实战经验以及同戈登、华尔、白齐



△八国联军士兵。

文还有其他外国人的接触，李鸿章很快便意识到，这些洋夷所拥有的力量是中国久经考验的兵法或治国之术所无法抗衡的。李鸿章头脑清醒，洞察力敏锐，他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将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意识到，如果仍坚守传统固步自封，中国将永远无法重建旧的秩序，甚至失去其主权和独立。此后，李鸿章一生均致力于努力使国人意识到这一真理。而他之所以被视为 19 世纪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因为他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其进步思想及执政之道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影响。而影响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这正是本书的目的。

李鸿章意识到西方的影响意义深远，有必要对中国的行政和国防体系进行重组以应对这种变化——这在他 1867 年上呈给清廷的一份奏疏中表达得非常明确。这份奏疏非常重要，它是一把钥匙，有助于我们对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清朝官吏的整个职业生涯有所了解。后文在适当的时机，我们会用更多的笔墨谈谈这篇奏疏。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对于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来说，能够意识到西方国家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在军事力量

上都技高一筹，并撰文大胆呼吁创新，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向清廷呈上如此一份奏疏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李鸿章的同僚——各省巡抚以及中央官员们——都普遍处于一种怎样的心智水平。总的来说，那个时候的清朝政府、大理寺、高级官员和儒生文人们大体上仍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这是两千年来中央王朝统治者的一贯风格。

对于那些对中国的行政体系不甚了解的读者来说，在这里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特别是在最后几位满洲统治者治下的具体情况进行简要介绍，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位清朝著名大吏的职业生涯。从理论上讲，从远古时代到19世纪初，中国的政府是绝对的独裁政府，这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原始形态，是基于祖先崇拜，基于因儒家体系的一贯性而彻底融入中国人生活的家长制度的基础之上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满清皇帝（除了乾隆这种乾纲独断的帝王以外）充其量也就只是政府体系之上一个装饰性的顶盖而已。皇帝每天的一言一行和所有的细节都受到清廷各种法规条文、条条框框的限制和制约，本应是天之骄子的帝王反而成为困在紫禁城高墙之内的囚徒。在家长制度中，皇帝处于天定的中心位置，其任务就是以大祭司的身份主持各种圣贤典籍里早已定好规矩的庄严典礼。事实上，在个人享有的主动权方面，皇帝的主动权甚至比不上那些最基层的官员。甚至是在自己的皇室专款和国家金库这样重要的事情方面，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也要获得官员的支持，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要取得百姓的支持和认可。正如本届政府的实际情况，专制的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官僚的手里。但即使如此，历史表明，这种权力仍受到百姓自作主张的造反权的制约；还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也限制了这种权力，那就是，中国的行政体系下权威的建立是以道德而不是武力为基础的。也正是因此，理论上中国官僚体系的独裁属性在实际中往往会被民众的民主本能所调和。

已故 W.F. 梅耶斯先生曾于1877年在其有关中国政府的经典著作中指出：

中国的建立依赖于无处不在的官僚群体。他们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产物，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基督教时代来临之前在中国已实行了数世纪的行政准则，并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之下拒绝引入任何与旧的理念相悖的理念和原则。

在这一精准的描述之后，梅耶斯又及时给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奉上了警戒箴言，因为即使在当时，这些人仍预言，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以及全部政治体制将会发生急剧的突变。梅耶斯写道：

对于这种状况的了解也许有助于修正那些过于乐观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中国都将迅速走上欧洲之路。为了取得实质性成果，在追求那些眼下暂时被忽略的主义和原则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摒弃这个国家的信仰中一些最为珍视的原则，把文人崇拜的偶像赶下神坛，放弃世人所公认的我们所有荣耀的源泉。而要导致这种变化的发生，如果不是革命的结果，通常都是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刻；倘若指望其自然地发生，终究只能是痴心妄想。

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长久混乱和动荡彻底动摇了满清政府的权威，令其元气大伤而无法彻底复原。但官僚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却丝毫没有受到撼动，官员们依旧颐指气使，自负傲慢。只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1860年之后，清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部门，这个以前的政府机构中所没有的全新部门就是大名鼎鼎的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其实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因为人员和人事构成的关系，越来越被视为是早已僵化腐朽的内务府的一部分，且忠实反映了后者虽偶有浮动，但总体来说僵化保守的状态。三十年来——即李总督职业生涯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总理衙门的主要功能就是充当中国行政部门和外国驻北京代表之间的缓冲器；其活动起到了制约而非扩展中国外交关

系的作用。一直到1890年以前，在清政府的所有官方机构名录中，都遗漏了对总理衙门的提及，这实际上正强调了这个部门可有可无的地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提到，1870—1895年间，中国外交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身兼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双重身份的李鸿章手中。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李鸿章从直隶总督卸任，进入总理衙门。1901年，外务部建立并取代了之前的总理衙门，李鸿章有幸活着见证了这一天。外务部所享有的权力和声望正反映了旧秩序的无能，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姗姗来迟，但慈禧太后终于开始转变观念、接受新的政府形式。倘若李鸿章活得再久一些，可以坚持到满清王朝的覆灭和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他将再次目睹满清传统是如何在这次巨变的混乱当中再一次全身而退毫发无伤，并且在政治经济的巨变和改革当中仍能保持唯我独尊的超然地位的。同时他也将再次目睹，在新旧中华的冲突和交替之时，官僚阶级又是如何岿然不动，超然之上的。

在李鸿章从政期间，皇帝表面上享有的独裁权力实际上掌握在由朝廷任命的中央和各省高官手中。乾隆之后，从18世纪末开始，由于皇室武装和道德力量的日渐衰落，满人声望日下，统治地位不稳，这些慢慢在不断扩大的汉满高官比中体现了出来。到20世纪初，汉族官员无论从数量还是级别上都把满族官员远远甩在了身后。也正是因此，1860到1901年间，朝廷官员和中央各部的直接动议权逐步丧失，其职能逐渐向监管和劝诫过渡。是自古以来皇帝可以不问缘由通过圣旨随意罢免官员的权力，以及民众对儒家传统教义的笃信和敬畏之心，才使得慈禧太后得以在有生之年在这种飘忽不定的平衡之中，通过其手腕和治国之术令风雨中的帝国仍勉强支撑。

除了在皇帝身边以顾问身份依法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军机处和在满清政府治下已基本沦为象征性部门的内阁，皇帝主要通过在京的六部九卿，各省督抚的奏疏以及都察院的建议管理国家。御史（共56人）的特殊职责是就影响政府行为和国计民生的大小事务向皇帝汇报并提出建议。两千多年来，朝代变迁，御史的这种特权地位一直岿然不动。即使在现在，在

所谓的民国体制之下^[1]，御史仍然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官僚政治制度中的一部分。满清末年，公职部门腐朽败坏的风气在都察院中反映了出来；“皇帝的耳目”过于频繁地任由最高发令者支配，其活动也沦为政治立场敌对的派别实现自己基本目的的工具。但他们当中总是不乏一些正直勇敢的斗士，他们坚定不移地追求黄金年代都察院创立之初的最初目的，公然抨击公职人员的腐朽，以上诉法庭的身份对抗上层不公正的行为。更有一些人，他们秉承御史神圣职责之传统，大胆行使权力，甚至批评朝廷及慈禧本人滥用职权。但大多数情况下，御史的主要工作都是一些阴谋诡计、收买情报和对李鸿章等高官的算计——这些高官位高权重，口袋满满，难免引得“局外人”想要联合起来，趁火打劫掠夺一把。

最后，在看得见的权威机构背后，在“宫墙深处”万尊之躯君王身边整日形影不离近身服侍的，是那些内廷宦官们。嘉庆之后，宦官对国家事务的影响与日俱增。之后的咸丰帝管理松散，宫廷内侍羽翼日渐丰满，更加变本加厉，昔日导致明朝下场凄惨并最终亡国的宦官专权的现象再次出现。咸丰死后，遗孀慈禧摄政，近侍大太监的影响日盛，宫禁之中，以及王朝所有级别的官衔和任命都全凭皇帝的喜好来。天性谨慎的李鸿章对以慈禧为代表的君主忠心耿耿。对于利用不义之财同慈禧最宠爱的宦官，特别是太监总管李莲英结交，李鸿章可以说是毫不犹豫。从1870年开始直到1908年慈禧逝世，李莲英权倾朝野，对清朝宫廷政治影响深远。按照清朝的皇室例律，宦官不得担任官职，也不得以任何借口离京。一直到咸丰之前，有关规定都非常严格。但慈禧摄政期间，权力到了太监手里，当初导致明末宫廷衰退的腐败阴谋和勾心斗角再次上演。在慈禧的庇护之下，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愈演愈烈，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面前的红人、慈禧私人小金库的保管者李莲英甚至公开夸口，说自己能成就也能毁灭哪怕是最高级别的高官，对身处皇位的光绪帝的权威也丝毫不放在眼里。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时候，李鸿章都被束缚住了手脚，想要推行的政策也

[1] 译者注：本书出版于1917年。此处所指为中华民国。



△慈禧。